

大理寺正卿 的失踪

蔣星煜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大理寺正卿的失踪

——蒋星煜历史小说选

蒋星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3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2 印张 12 字数 268,000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5-0547-2

I·327 定价: 4.40 元

徐 序

我读过很多星煜同志的戏剧研究论文，非常钦佩他的博学多识，提出新见解的理论勇气。但直到这次先睹为快地读到了这批历史小说，才知道他在小说创作方面，还有这么多的成绩，而且从事此道，已有四十年之久了。他的用心之深，精力之强，实在难得。

正像写历史剧一样，写历史小说很不容易。虽然写的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些事情大家都已听说过或读过某些原材料，但要把它写成文艺作品，不是简单地照搬，又要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揭示出过去事情、过去人物活动对今天生活的新的意义或启发，如果缺乏对历史的熟悉、对历史人物的生动理解、对艺术表现的诸多才能，以及对当代生活的关注和洞察，就不可能作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再创作的艰苦劳动，实际是一种新的文艺创作，它拥有大量读者，决不是偶然的。《三国演义》的影响远比正史中的《三国志》大，尽管前者并不能代替后者。后者主要给读者历史知识，前者则除此以外，还活生生地写出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性格，正是这些独特的描写紧紧地抓住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尽管小说作者的倾向已不再能左右我们，它的艺术魅力无疑还是很强，因为中间毕竟仍保留着许多并未成为过去的东西，

我们谁不知道曹操？由于对这个历史人物向来有褒有贬，对所褒所贬又不断因时代变异在翻案，所以可能每一位读者心目中都有一个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的曹操。曹操本人性格的复杂性加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会出现这种复杂情况并不奇怪。舞台或小说中出现若干个不同的曹操形象没有什么坏处，这也可以使我们学会多方面来理解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得到比只从一个方面一种角度来评论时更完整一些的认识嘛！本书中《东方式妬忌之王》就是从多谋好妬这一角度来写曹操这个人物的。包括华歆和崔琰，作者对他们的心理描写细致微妙，而且是顾到了他们之间的固有关系，虽有褒贬却还是符合他们相互关系和性格逻辑的。这不仅能给读者艺术享受，实际上通过文学作品可以给人以一种思维训练力量，让人增加对社会对各种人物的某些理解。《马锦演戏》是对《马伶传》的扩充和再创造，不仅很有趣，也可说明古人对深入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是颇有了解的。

作者在他的每一篇再创作中总想把某种进步的、健康的、对现实生活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包含其中，我很赞同这一做法，即使成为一个作家自觉的意图，我认为也是毫无损于任何审美价值的。我不认为一个人真能脱离实际社会而“超越”，如果是有价值的“超越”的话。“超越”而必然要以“压抑”别人为代价，这实际是品格卑下的表现。古人早知“越世高谈”之无益了。一味想“空灵”，至少必流于萎靡，不吃人间烟火食的神仙，哪里有？力量小些不要紧，社会责任感不能没有。

星煜同志这些历史小说深入浅出，相信会雅俗共赏。有幸先睹，我只能略表读后的喜悦之感，读者同志一定能从中

体会到更多的教益的。

徐中玉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

自序

这部选集的编选出版，引起了我的回忆。

一九四〇年，我正好二十岁。开始学写小说，写得很干巴，枯涩，缺少形象思维，结构也很松散。篇幅也短，一般只是两三千字。发表了有《祖国怀念者》、《江南采莲曲》、《小江北的故事》等等，因为真的是涂鸦之作，所以没有保存。不能说没有收获，知道了自己的短处，知道了创作的甘苦。后来写的作品稍微好一些，也是在这一种艰难的探索之后，不断地作了反思，才有寸进。因为在这方面我毫无天赋。

经过短时间的“整休”，写了以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汉奸文人的可耻下场为题材的《马原先生》，写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发国难财的大资本家家庭内部荒淫生活的《周末小景》，虽然还不够成熟，称之为短篇小说，我认为是合式的，够格的。

胜利之后，我写了《瀑布山中》，对反动统治之下一些机关的腐败和官僚们的相互倾轧略有暴露。也只是一篇小小说。

从少年时代起，我一直对历史学深感兴趣，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没有放松对古代史、古代文化史的钻研和探索。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六年分别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出版了《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颜鲁公之书学》这两本学术论著。对

某些历史人物的遭遇，我有着各方面的深刻的感受，很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些题材，如果加以新的分析和处理，写成小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于是写了《孟子去齐篇》和《嵇康》。

隔了十多年之久，直到建国以后的一九五九年，才又接受《解放日报》布置的任务，写了《南包公海瑞》，接着于一九六三年，又写了《李世民与魏征》，这两篇历史小说，题材和主题都是《解放日报》根据党中央有关文件而决定的，我不过是把这些素材予以“小说化”而已。根本没有想到《解放日报》及其总编辑魏克明同志和我竟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四人帮”被粉碎后，终于得到了昭雪。

苦难使《解放日报》和我的关系比当初更密切起来，又组织我写了历史小说《司马迁》和《刘邦、萧何和韩信》，当然，绝大部分历史小说是我自己主动写的，如《左光斗与史可法》、《少林和尚的倭刀》等等。

我曾在《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发过一篇《海瑞巧办胡公子》，距离发生一件大诈骗案的时间相当近，有人就问我：是否针对大诈骗案而写？真使我啼笑皆非。少年儿童出版社准备重印那本专写海瑞的历史小说时，问我能否再补写几篇，我说材料是有的。于是补写了两篇，连同前作共是三篇，此文主要写明代浙闽总督胡宗宪公子横行不法，海瑞用计予以严惩，胡宗宪自知理亏，不敢与之正面较量事。写成之后，送到报社，积压了两三个月才发，而那件大诈骗案就发生在这两三个月之中。怎么可能是针对那个案件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播发短篇小说，但基本上是马克吐温《竞选州长》、欧·亨利《麦琪的礼物》等世界名著，竟也破格把《海瑞巧办胡公子》连播了近十次。人们要对这篇小说产生一些联想，

或者有某种特殊的感受，作者原是无法也不应该干涉的。

另外一个刊物，对我的历史小说的写作也起了持续的推动作用，那就是《青年一代》，主编夏画同志来向我组稿，我交了《霍去病回朝》。后来在一起研究了题材，陆续写出了《汤显祖赶考》、《诸葛亮招亲》等，曾经有两年之久，《青年一代》每一期都有我的历史小说一篇。后来，刊物的内容和篇幅都有所改变，我们的合作就告一个段落。

在建国以来的三十八年之中，我发表历史小说的报刊还有《文汇月刊》、《少年文艺》、《青年报》、《劳动报》以及江苏的《雨花》、河南的《奔流》、广东的《湛江日报》和《海石花》等。

编辑同志为我的历史小说作了认真的修改，有的还仔细查阅了有关历史文献，都使我深为感动。但遗憾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京兆尹画眉》、《左光斗与史可法》纯粹由于篇幅的关系，被各删去了二、三千字，虽然不牵涉到主要情节，但有关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都没有了。而且删去的部分没有交还我作者本人，而我又没有留底稿，所以这两篇小说实际上只是“残稿”，如果不删，或者退还给我，则读者现在翻阅的这两篇小说一定要完整得多。

这些作品，创作的劳动情况，或者说操作规程，并不完全相同，大体上也可以区分一下：

如《南都名伶》，是以侯方域《马伶传》为框架，再浓化某些细节，并把原作一笔提过的在顾秉谦相府中为仆役的经过作为主要关目写了。为了尽可能保存原作的历史感，对于明末南京的社会风尚、山川景物，我都没有忽略，应该加以衬托之处都点缀了几笔。因为我读了许多南明前后的野史随笔，对

《桃花扇》也比较熟悉，加之在南京曾经住过几年。所以才有条件这样写。如《左光斗与史可法》，完全脱胎于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实际上进行的是扩写工作，对于明末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的史实，我本来就作过专题研究，史可法的文章、书法，我都深感兴趣，加之以先后曾六七次到扬州，凭吊梅花岭下的史可法衣冠冢。我自己觉得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形象还不致于十分单薄，因为在我内心深处的确有这样的形象存在，问题仅仅在文学语言如何表达而已。至于《刘邦、萧何与韩信》，称之为戏曲故事，也无不可。基本上把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改编了一番。情节无丝毫改动，枝叶稍有增删。由于当年周信芳同志亲手把这个剧本交给我，要我帮助他做校订工作，所以我对之有特殊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他在剧中的精湛演技，也联想到他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悲惨情景，所以心里极不平静。剧本对景色没有渲染，我因为一九四六年春末夏初到汉中旅行过，那些残存的险峻的栈道、参天的汉柏、荒凉的古庙等等，印在脑海深处迄今未泯灭，如今正好变作了这篇的布景，所以不知不觉之中就经常显示出来。以上三篇小说，应该说前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我是从中间体开始，予以改写、扩写或改编。即使是这样，如果对原作没有吃透，如果缺乏有关历史背景的各方面的知识，如果对这些历史人物感情十分淡漠，那还是不行的。

再如《诸葛亮招亲》、《大理寺正卿的失踪》、《刘伯温被迫成仙记》、《以戏代药》等篇，有的过去并未有同一题材的小说，有的虽有小说或戏曲，却相当低级庸俗，甚至有浓浊的封建迷信色彩，我就从零开始，根据史料或诗文集集中的三言

两语重新结构故事，重新按历史真实去塑造人物，不再受《三国演义》、《精忠说岳》、《大明英烈传》等历史小说左右。正因为这样，我自己觉得作品中的诸葛亮、周三畏、刘伯温比正史和古典小说中的形象要平凡得多，要和生活接近得多，他们并不高不可攀，而是充满了人情味。在我笔下，诸葛亮对婚姻问题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他并没有事先确立选择对象以思想美、精神美为原则的标准，也没有鄙弃形态美、容貌美的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阿丑才华盖世，也就不再斤斤计较阿丑的容貌而已。审理岳飞一案的大理寺正卿周三畏，是矛盾焦点上的人物，秦桧要求把岳飞立即处死，而他完全明白岳飞是无罪有功的，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宣判岳飞死刑，他要宣判岳飞无罪，当然最好，但不可能，即使这样判了，也是徒劳的，秦桧可以派人重判。他能够悬印出走，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象这样一件大事情，秦桧不可能不对周三畏进行威胁利诱的拉拢，周三畏的家庭也不可能不因此而发生极度的动荡，所以我主要写这两个场面。这正是《精忠说岳》小说所未出现的空白。刘伯温是聪敏绝顶的大知识分子，古往今来的历史，他如洞烛。对于朱元璋，他可以说知之甚深，但是，他终于还是猜不透朱元璋某些计谋，即使猜透了，他仍旧想不出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方法，所以仍旧难逃“伴君如伴虎”的厄运。

最近发表的一篇写曹操派人刺死匈奴使节的历史小说，实际上也与《诸葛亮招亲》等篇同一类型。不管行家的评价如何？不管读者的反映如何？我个人则最喜爱这七篇作品。

有人认为我的风格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较为明显，这是一种客观的分析，我表示同意或不同意，都没有什么作用，

却引起了我的思索。对于故事的铺叙发展，我都是顺序而进，不采用倒叙手法，线索尽可能单一化，万不得已时，才用一点交叉的结构，所谓“蒙太奇”，我不擅长，而且也认为在短篇小说中不应该用。因为是历史小说，语言自然不可能太现代化或西洋化。这恐怕是人们认为我受中国古典小说影响较为明显的原因。

中国古典小说，我读了不少，真正爱而且迷的也只有《三国演义》和《今古奇观》，对其他作品，如《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我承认都很伟大，却不太喜欢。对《儒林外史》，我认为是彼此联系不甚密切的短篇小说的一个大拼盆。真正有影响的恐怕只有《三国演义》和《今古奇观》。现代中国小说，沈从文、许地山、陆文夫读得多些。西方的短篇小说，我十分倾倒莫泊桑、欧·亨利、左琴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对屠格涅夫，我最喜爱《猎人笔记》。我说不出写历史小说时究竟在那些地方得益于那几位作家，那几部作品。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没有阅读那些小说，我一定会写得比现在更少更差。

历史小说虽然一直不太繁荣，但却始终存在着论争，尤其是要不要尊重历史记载？虚构可以到怎样一个程度？如何古为今用？如何避免反历史主义的偏向等问题？过去我几乎没有参加，或很少参加讨论，我的作品实际上就是我的答案。在这里，也想作一些综合性的说明。

既然称之为历史小说，我们又没有可能再回到那个遥远的历史时代去深入生活、感受生活，选择一些有关的历史文献去研读一番，以加深对那个时代、那些历史人物的了解和理解十分必要。我的意思倒并不是要求小说的情节一定要和

历史记载完全符合，小说有她的艺术特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对历史记载中的情节势必要有所筛选、改造、甚至发展或增添。否则的话，人物的形象就难免单薄苍白，主题思想的突出和完成就落了空。但这一系列工作，也只有在熟悉并掌握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离开了这个前提，艺术的虚构就成了主观的捏造。失去了历史感的历史小说，也必将失去读者。

历史小说能不能古为今用？我看从来就是古为今用的。我们研究历史学本来就是古为今用，不仅是为了了解人类过去走过的道路，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走好今天应该走的道路，更是为了选择将来前进的道路。更何况历史小说，作者的爱憎比史学家更外露，作品的倾向性比史学著作自然也就更强烈，所用的语言也不象史学著作那样冷静，而是带了各式各样的激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至于历史事件中所包孕的经验、教训，那是历史事件本身所决定的，历史人物的成功或失败，也是他本人决定的，这成功或失败都是从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十分可贵，使后人为之敬仰、为之赞美、为之浩叹、为之惋惜、为之愤怒……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都是必然的。我们历史小说的作者不过把这一切用文学语言表达出来罢了，决不是也不应该挖空心思地去作背离历史的肯定或否定。

也有部分作者，即使对历史文献研究有素，由于对“古为今用”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陷入了唯成分论或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淖，结果就出现了纪律和人民解放军同样严明的农民起义军，对帝王将相过分美化或对之有苛刻的要求，对兄弟民族的英雄人物则肆意贬低。如果认为历史小说中一定要

出现我们可以直接向之学习的人物，以上的种种反历史主义倾向永远不会得到纠正。我认为，我们只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得到启迪。因为古代社会早已是陈迹，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有了本质上的转变。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倒退为封建社会，当然无法直接学习历史人物啊！

衷心感谢徐中玉教授为本书撰写序文。

具体的编选工作是我自己在做的，我的四儿金轮为我分担了大部分的琐碎事务，使我能够集中精力于案头。

文艺界、出版界的朋友们为编选工作给予协助和支持的有杭州大学吴秀明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何梦祥同志、少年儿童出版社武蓉之同志、少年报社徐奋同志等多位，有的提了宝贵的意见，有的千方百计为我搜集原作，有的为我抄录了大量稿件，并对标点符号以及简化字作了必要的校正，使我铭感于心，不敢稍忘。一并致谢于此。

目 录

徐中玉序.....	(1)
自序.....	(1)
拜将.....	(1)
挂剑.....	(13)
甘罗.....	(26)
司马迁.....	(45)
驿丞的女儿.....	(66)
东方式妒忌之王.....	(72)
诸葛亮招亲.....	(103)
嵇康.....	(117)
廉石.....	(133)
绛幔授业.....	(144)
公主的镜子.....	(153)
李世民与魏征.....	(183)
功臣的晚节.....	(197)
白居易拜师.....	(208)
三掷砚.....	(221)
重开惠民河.....	(231)
大理寺正卿的失踪.....	(242)

刘伯温成“仙”记.....	(250)
况夫人做寿.....	(260)
少林和尚的倭刀.....	(273)
爱护长官的名声.....	(284)
斗钦差.....	(296)
买棺谏君.....	(306)
告老还乡者轶事.....	(322)
赶考.....	(331)
狱中的诀别.....	(344)
南都名伶.....	(350)
棋坛国手.....	(362)

拜 将

齐国自从任命晏婴为相国以后，和鲁国的交往也比以前密切多了。男耕女织，出现了几年承平的景象。

对于晏婴，齐景公是非常信任的，因为他深知晏婴确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且又对自己一片忠心，并没有什么野心。照理说，这样的局面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大夫庄贾心里却很不服，他是专门靠向齐景公献媚阿谀而爬上高位的人，他把晏婴看成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他觉得，在齐国，景公之下，就应该轮到他大夫庄贾了，晏婴早就应让出相国之位了。

晏婴是个很聪敏的人，对于庄贾究竟是何等样人这一点，他完全了解。庄贾经常陪伴齐景公寻欢作乐，进些谗言，晏婴也不无所知。只是看到对大局影响还小，而且齐景公对庄贾就如对最宠爱的姬人一样疼爱。晏婴感到要办庄贾的话，不能草率从事，因为弄得不好，也许会发生一场动乱。

西方的晋国和北方的燕国一直把齐国看成是挂在嘴边的一块肥肉，随时随地都想一口吞下去，不过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罢了。如今看到齐国朝廷里面乌烟瘴气，据说公孙捷等三员勇将也都死了，他们认为机不可失，就决定各自分兵两路，会攻齐国。

齐景公得知晋国、燕国已出兵来攻的消息，好象冷水从天灵盖上直浇下来一样，惊慌得不知所措，似痴似醉，一直到午夜才清醒过来，立即宣召晏婴进宫。

晏婴说：“晋燕久有亡我之心，此番兴兵前来，自然要严阵以待。”

齐景公说：“此言甚是。唯公孙捷等均已作故，三军虽勇，不可无将。是以我心甚忧。”

晏婴说：“边报我也已得知，恐惊扰大王安眠，故未敢进宫求见，应召始来。此事微臣已作过反复考虑，不知是否周详耳！”

听到晏婴这样说，齐景公的面色才从苍白渐而变成微黄，紧绷着的肌肉稍微松弛了一些，他的心也不象刚才那样剧烈地跳动了。他对晏婴说：“爱卿真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啊！莫非你已对大将人选作了一番深思熟虑？”

晏婴说：“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言之重矣！古之伊尹、姜尚，或可当之无愧。微臣望尘而莫及。大将人选，我则确已物色到了。”

齐景公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卿已为寡人选就大将，寡人无忧矣！所选何人？莫非大夫庄贾乎？”

晏婴听到这番话，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深知齐景公为人有时糊涂有时清醒，庄贾既然对他天天歌颂阿谀，他把庄贾当作有大本领的人，完全合情合理。现在军情紧急，他不想和齐景公多谈庄贾的短长，就把自己的打算三言两语说了出来：“臣所保荐者为田穰苴，其人不肯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一官半职，索居于东海之滨久矣！”

田穰苴，这名字从来没有听说过。齐景公一下子思想上